

魯迅事蹟

魯迅事蹟考

林辰著

開明書店印行

魯迅事蹟考

一九四八年七月出版

一九五〇年四月三版

每冊基價・四〇五

印刷者

開明書店

發行者

上海福州路
開明書店
代表人范洗人

著作者

林辰

有著作權 ■ 不准翻印

孫 序

從魯迅先生去世到今年十月，已經是整整的十週年了。

他的生前友好，和國內外敬仰愛慕他的萬千青年，在這整整十年以來，如何以他的思想學術事業爲根柢，從而發揚光大到如何宏遠淵深的地步，這問題我此刻不準備述說。

這十年除了首尾兩年以外，當中的八年，全民族正在與日本黷武主義者搏鬥中；魯迅先生的生平事蹟，當初也是東一鱗西一爪的，經過這八年的長時間，不僅組織不成片段，連一鱗一爪也不免被淡忘了。這是嚴重的遺憾，不只是他的生前友好和國內外萬千青年的，也是整個國家民族整個世界人類的。

林辰先生的「魯迅事蹟考」，卻給我們減去了不少遺憾，增加了不少慰藉。全書共計論文十篇，從題目看，就知道每個題目都與魯迅先生整個傳記有關，整個傳記就靠數十百篇這樣的論文拱衛着。

傳記作者必須對於材料有廣博的知識，有的是他要選取的，有的是他要做旁證的，有的是他必須知道但未必有選取價值的。這三類材料，在這拱衛傳記的數十百篇論文中，必須盡量的羅列着。林辰先生這十篇論文裏面，就包含了這三類材料。例如魯迅先生歷次的演講，對於整個傳記也許並不重要，傳記作者可能不加選取，但是他必須有此知識；這便是第三類。又如章門諸子的事蹟，並不算傳記的直接材料，但傳記作者必須拿它作爲旁證；這便是第二類。至於與章太炎的關係，歸國的年代，赴陝的講學，曾否加入光復會，組織文藝會社等等，便都是第一類重要材料。

了。

羅列材料以外，便是方法的說明。傳記工作的初步條件，只是方法的細密與謹嚴。等到傳記寫作的時候，不能再有方法的說明了。林辰先生這十篇論文，都代表了極細密謹嚴的方法。無論解決問題的方法，排列材料的方法，辨別材料真偽的方法，都是極細密謹嚴的。在「論『紅星俠史』非魯迅所譯」一文裏，記述作者研究方法的辨證的發展，因而材料的排列也依着這辨證的過程，最後纔把「紅星俠史」譯者自己所作的一篇「鬚鬚爪序」介紹出來作為鐵證，斷定「紅星俠史」絕非魯迅所譯。在「魯迅曾入光復會之考證」一文裏，因有「曾入」與「不曾入」兩派的意思，作者仍以辨別材料，排列材料這兩種方法的骨幹，再用他那敏銳的思考，勇敢的推斷，把這個問題穩穩妥妥地解決了。這幾種方法，既細密又謹嚴，供給將來的傳記作者一個極可寶貴的參考。無論這傳記作者是林辰先生自己也好，或是另一位也好，有了這樣細密謹嚴的方法，決不會再寫出沒有價值的傳記的了。

我私心希望這位未來的傳記作者就是林辰先生。自然，說得廣泛一點，凡屬魯迅先生的生前友好，和敬仰愛慕先生的萬千青年，心頭都有一篇或詳或略，或粗或細的魯迅先生的傳記，但是放在心頭和寫在紙上似乎確是兩件事。一旦動筆，即刻感到材料不夠，印象模糊。因此我自己就是林辰先生所作考證論文的一位愛讀者。

林辰先生如果能再繼續寫作這類考證論文若干篇，即使一時沒有傳記，我們讀了這樣細密謹嚴的論文，其快樂也不會下於閱讀整本的傳記，至少使以後的傳記作者省卻許多考證的工夫了。

孫伏園 三十五年，七月二十八日，在緬雲山

目 錄

孫序	三
魯迅會入光復會之考證	三
魯迅與章太炎及其同門諸子	一二
魯迅歸國的年代問題	二三
魯迅赴陝始末	二八
魯迅北京避難考	三四
魯迅與文藝會社	四一
魯迅與狂飆社	六五
論「紅星佚史」非魯迅所譯	七八
魯迅的婚姻生活	八三
魯迅演講繫年	九六
後記	一〇四

魯迅曾入光復會之考證

「清的末年，社會上大抵惡革命黨如蛇蝎，南京政府一成立，漂亮的士紳和商人看見似乎革命黨的人，便親密的說道：『我們都是「草字頭」，一路的呵。』」

這是華蓋集「補白」篇中的一段。就由於有這類冒牌的投機取巧之徒，使得本不會向人自炫的真的「草字頭」，在革命成功以後，更加諱言自己的革命經歷。像這段文字的寫作者魯迅先生，便是這種人中的一個。

當魯迅留學日本時，正是辛亥革命的前夕。在那如火如荼的東京留學界的革命活動裏，魯迅也實際的參加了政治組織，成為光復會的一員。光復會約成立於一九〇三年頃，是清末一部分進步的知識分子和會黨分子所組織，主要的領導者為章太炎。後與興中會，華興會合併而成同盟會。它的會員，以浙江人為最多，魯迅亦為浙東人的參加者。但他後來，無論在文字上，在口頭上，都從未提及此事，故世間知道的人極少。直到他逝世以後，民國二十六年，許壽裳先生在「魯迅年譜」裏，纔把這件湮沒了將近三十年的事，鄭重地提了出來：

「民國前四年（清光緒三十四年，戊申，一九〇八年）二十八歲。

是年從章太炎先生炳麟學，為「光復會」會員，並與二弟作人講域外小說集。」

由這，我們纔知道了魯迅生命史上的這一件大事，更清楚地尋出了魯迅後來所沿以發展的思想行為的早年的線索。這在我們對於這位偉大作家的認識和研究上，實在是極其重要的事情。

然而，卻有人提出了相反的意見。值得注意的是：這人又正是魯迅的二弟（一）周作人。「年譜」民元以前用陰曆記載的部分，原是許先生就周作人所記增訂而成，周在原稿內即未載入光復會事。在「關於魯迅之二」裏，他更以正面的堅定的語氣，積極地加以否認：

「但他（指魯迅）始終不會加入同盟會，……他也沒有入光復會。……以浙東人的關係，豫才似乎應該是光復會中人了。然而又不然。這是什麼緣故呢？我不知道。」（宇宙風第三十期，後又收入魯迅先生紀念集。）

因為有這正相反對的兩說，遂致研究者紛紜莫定，或從許說，或從周說。前者如平心先生，他在「論魯迅的思想」一書裏，便據「年譜」肯定魯迅為光復會會員，說：

「魯迅是封建專制主義的猛烈攻擊者，是民主政治制度的熱烈追求者，因此他在辛亥革命時代，對革命懷着渴望光明的期待，並且一度參加過光復會。」（頁七二）

「當時孫中山，章炳麟等所推動的民族革命運動已經震動全國了。進步的青年都捲入在革命的浪潮中。魯迅在發表上述論文（按指摩羅詩力說）的次年（一九〇八年），即『從太炎先生炳麟學』，並且加入了光復會。」（頁一九二）

又如歐陽凡海先生，他在「魯迅的書」的第五節裏，也說：

「這年（按指一九〇八年）豫才不但努力翻譯新文學，並且直接加入光復會為會員。推翻滿清的革命，到這幾年已經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概，……革命的怒潮已向着每個角落裏激蕩，是在這樣的時候，豫才便也被捲入光復會裏去的。」（頁七九）

還有胡風先生，在「從有一分熱發一分先生長起來的」一文裏，特論也與「年譜」相同：

「由於『新生』底失敗所引起的反抗，和『青年』時候的憤慨激昂的意思」（吶喊自序），這時候（一九〇八年）又在他底生命史上發生了一大事件：他加入了光復會。」（羣衆八卷十八期）

在附註裏，胡先生更舉出他和魯迅的一次問答：

「周先生加入過×××（原文）沒有？」

「沒有，我加入的是光復會，不過這件事沒有人知道……」

但另一方面，也有意見與周作人相近的人。如王冶秋先生，在「民元前的魯迅先生」一書內，便這樣說：

「魯迅先生這一時期除了文藝以外，因出入民報社的關係，認識了許多同盟會的人，而與徐錫麟等同組光復會的陶煥卿（成章），也因徐刺恩銘案亡命來東京，因為同鄉的關係，常到先生的寓所或民報社談天。……可是結果先生既未加入同盟會，似也沒有入光復會。（『年譜』中作會入光復會，知堂文中說並未加入，未知孰是？）」（頁一〇八）

這裏雖未完全肯定，但語氣上，是傾向周說的。（他說「似也沒有入光復會」，不說「似會入光復會。」）所以下文接着便說：「他對政治組織沒有實際的參加。」（頁一二二）這顯然已是肯定地贊同周說了。

事實究竟是哪樣的呢？我的意見以為「年譜」所說「爲光復會會員」，是符合事實的。

魯迅之赴日本，是在一九〇二年。自此以迄一九〇九，留日計凡八年。在這期間，國內革命

運動，風起雲湧，武裝舉義，連年不絕；而東京以活動較便，途程較捷等關係，當時簡直成了革命的策源地。排滿的各種集會，講演，時有舉行；各種書報，紛紛出版。革命空氣，瀰漫整個留東學界。在這種情形下，本來就是熱情，豪習，舊學新知，都已具有根底的魯迅，又得接觸各種人物，閱讀各種書籍；感故國的飄搖，受異邦的刺激，在思想行為上，自然會發生很大的影響。他在出國以前，即已接受了「維新」的思想，到這時候，便自然的進了一步，接受了民族革命的思想。他遙對着「風雨如磐」的故國，立下了「血薦軒轅」的誓言和決心。他宣揚與波斯王大戰的斯巴達人的戰鬥精神和愛國主義；謳歌「立意在反抗，指歸在動作」的拜倫，普式庚，裴兌飛……諸詩人的「摩羅」精神。他之決意學醫，是因為「知道日本維新大半發端於西方醫學的事實」，預備卒業回國，假醫學「促進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」。他之放棄醫學，改習文藝，是因為後來認清了「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，凡是弱國的國民，……第一要着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」。而文藝正是善於改變精神的利器。他介紹域外文藝，特別偏重俄國和被壓迫民族的作品，是想用那些吶喊和反抗的聲音來激勵處境類似的自己的民族。他往聽章太炎講說文解字，目的並非專為獲取知識，卻是「爲了他是有學問的革命家」。除了這些聲聲大端以外，還有一些細節，如徐錫麟，秋瑾被殺的消息傳到東京後，人心憤怒，同鄉會開會追弔，魯迅也主張打電報到北京痛斥滿清政府的無人道。他熱烈發言，還堅執地和不主張發電的人爭論。（見范愛農）有一次，他從仙台回東京，特地中途在水戶下車，去憑弔明末遺民朱舜水的遺骸。（見許壽裳：王夢民元前的魯迅先生序）而且就在留日期間，他便毅然將髮辮剪掉了。由這種種，可見魯迅這時的一切言行，莫不與民族主義精神息息相通。在那時間，在那地點，他實在是有可能實際參加政治組織的。

這裏，還值得特別述及的，是魯迅當時所往還的那些人物。他在努力讀書，作文，翻譯以外，也和別的留學生一樣，一有功夫，「就赴會館，跑書店，往集會，聽講演。」（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）他這時的交遊自然是極廣的。但他對於那些只知道在會館裏「咚咚咚地」「學跳舞」，（藤野先生）「關起門燉牛肉吃」（雜論管閑事，做學問，灰色等）的無聊之徒，很看不慣。他所與交往的多是光復會，同盟會中人。如章太炎，是光復會的領袖，道德文章，革命勳業，彪炳一世，魯迅曾從他問學，這裏不用說了。章以外有陶成章，字煥卿，會稽人，光復會的中堅分子，與徐錫麟同為大通學堂的創辦人，（見國民黨中宣部編：革命先烈傳記：徐錫麟傳）在江浙會黨中極有力量，是清末革命史上重要人物之一。他與魯迅往還頗密，後來魯迅在所寫的文字中，曾經一再提到他。其一，在華蓋集「補白」裏：

「徐錫麟刺殺恩銘之後，大捕黨人，陶成章是其中之一，罪狀曰：『著中國權力史，學日本催眠術。』（何以學催眠術就有罪，殊覺費解。）於是連他在家的父親也大受痛苦；待到革命興旺，這纔被尊稱為『老太爺』；有人給『孫少爺』去說媒。可惜陶君不久就遭人暗殺了，神主入祠的時候，捧香恭送的士紳和商人尚有五六百。直到袁世凱打倒二次革命之後，這纔冷落起來。」

其二，在華蓋續集「爲牛農題詔何典後作」內：

「想起來已經有二十多年了，以革命爲事的陶煥卿，窮得不堪：在上海自稱會稽先生，教人催眠術以糊口。有一天他問我，可有什麼藥能使人一嗅便睡去的呢？我明知他怕施術不驗，求助於藥物了。其實呢，在大眾中試驗催眠，本來是不容易成功的。我又不知道他

所求的妙藥，愛莫能助。兩三月後，報章上就有投書（也許是廣告）出現，說會稽先生不僅懂催眠術，以此欺人，清政府卻比這干鳥人靈敏得多，所以通緝他的時候有一聯對句道：

「著中國權力史，學日本催眠術。」

前者因有感於那些「漂亮的士紳和商人」的冒充「草字頭」，因而聯想到陶的真正革命；後者由劉半農的印何典而被正人君子笑罵，聯想到陶的「教人催眠術以糊口」而被清政府通緝。辭句之間，是那裏充滿同情，親切，敬佩，可見兩人在二十年前的交誼之篤。周作人在「關於魯迅之二」裏，也有幾句提到陶成章，可供參看：

「當時陶煥卿（成章）也亡命來東京，因為同鄉的關係常來談天，未生大抵同來，煥卿在連絡江浙會黨，計劃起義，太炎先生每戲呼為『煥強盜』或『煥皇帝』，來寓時大抵談某地不久可以『動』，否則講春秋時外交或戰爭情形，口講指劃，歷歷如在目前。嘗避日本警吏注意，攜文件一部分來寓囑代收藏，有洋抄本一，係會黨的聯合會章，記有一條云：凡犯規者，以刀劈之。又有空白票布，紅布上蓋印，又一枚紅緞者，云是『龍頭』。煥卿嘗笑語曰：『填給一張正龍頭的票布如何？』數月後，煥卿移居，乃復來取去。」

由此不難想見陶成章在東京時的活動情形和他與魯迅的關係。又有龔寶銓，字未生，嘉興人，亦光復會的中堅分子，與陶成章，徐錫麟等關係極深。（見國民黨中宣部編：徐錫麟傳）他是魯迅聽章太炎講學時的同學，上引周作人文說「未生大抵同來」，足見他們常相過從。那和徐錫麟相約同時舉義而被殺的秋瑾女士，山陰人，光復會會員，亦與魯迅熟識。景宋先生在「民元前的魯迅先生」一文內，曾說：

「秋瑾女士，是同時的留學生，又是同鄉，所以也時常來訪。她的脾氣是豪直的，來到也許會當面給人過不去，大家對於她來都有點惴惴欲避，但是假使趕快款待餐飯，也會風平浪靜地化險為夷。那時女留學生實在少，所以每有聚會，一定請她登台說話，一定拚命拍手。」

這末尾所說，大約是魯迅當時在集會裏常見的實情，他而在已集「通信」中也會略略提過。與秋瑾，徐錫麟同時，在安徽戰死的陳伯平烈士，會稽人，被害的馬宗漢烈士，餘姚人，都是光復會會員。（章太炎：徐錫麟陳伯平馬宗漢傳）他們初抵日本留學時，魯迅曾到橫濱去迎接他們，（范愛農）以後想也有往還。又許壽裳，字季弗，山陰人，與魯迅一同就學於章太炎，爲魯迅的終生好友，亦光復會會員。此外還有陶冶公，陳潛等人。陶初名鑄，字望潮，後以字行曰冶公，（周作人：關於魯迅之二）會稽人，成章即其姪子。（見陶先生悼魯迅詩前王冶秋按語）在東京與魯迅共習俄文，後在長崎從俄人學造炸藥，（見周文）辛亥時曾率人攻打上海製造局。（見王按語）陳字子英，山陰人，曾與徐錫麟在東湖密謀革命，徐殉難後，逃往日本，（周作人：關於范愛農）亦魯迅學俄文時同學。（關於魯迅之二）光復後，紹興少年們辦「越鐸」報，曾借用他和魯迅的名字作發起人。（見范愛農，報名「越鐸」，則據關於范愛農。）兩人也都是光復會會員。（據許壽裳先生覆作者函）這些人，在學識，性情，年齡上，各有殊異，和魯迅往來的時間，有久有暫；情感也有深有淺；但他們卻有一點共同的地方，就是都是光復會的會員。（同盟會成立後，也有加入同盟會的。）「不觀其人，先觀其友，」從魯迅所交往的這些師友，大約也可窺察出他當時是怎樣的一個人罷。

再就歸國以後的事實看，他在紹興府中學堂任教職時，學生們便知道他「和同盟會及徐錫麟有過關係，……是革命黨」。（胡愈之：我的中學生時代）大約就在這時或前後不久，他又加入了和光復會，同盟會排滿運動相呼應的革命文學團體「南社」。（據景宋云：加入南社係紹興府中學堂學生宋紫佩所介紹，但據孫伏園先生覆作者函，則謂宋為浙江優級師範學校學生。許說實訛，蓋伊並孫伏園亦誤認為紹中學生也。宋既為在杭任教時所識，故我以為加入南社當在此時前後。）不久，武昌起義，紹興光復，他這被青年們視為「革命黨」的人，便出任紹興師範學校校長了。在紹興光復之初，人心浮動，他曾召集了全校學生組織一個「武裝演說隊」，在市面上遊行一通來鎮靜人心，對於紹興的光復幫助很大。（參照景宋：民元前的魯迅先生，孫伏園：惜別。按魯迅於宣統三年暑假中由紹興府中學堂「走出」後，即未任教。故在紹興尚未光復之前，魯迅是無從召集學生遊行的；至紹興光復後，擔任師範學校校長，此事始有可能。又據孫伏園「惜別」所述，孫曾親身參加此次武裝演說隊的遊行，而孫係師範學校學生，故這必為光復後任紹興校長時的事，時間並非紹興尚未光復之「頃」，而乃光復之「初」。許文時間，必有訛誤。此處所述係就許文改動而成。）這時紹興的都督為王金發，本「綠林大學出身」，（范愛農）也是光復會中人，與徐錫麟，秋瑾，陶成章，竺紹康等同謀革命，（印水心：國史讀本，世界版）在秋瑾被捕的數小時前，他還從嵊縣來和她商議起事計劃。（中宣部編革命先烈傳記：秋瑾傳）他「和魯迅先生也是朋友」，（見前揭景宋文）魯迅在「范愛農」和「論費厄薩斯應該緩行」二文裏，曾提到過他。但較詳細的是周作人的「關於范愛農」：

「王金發本在嵊縣為綠林豪客，受光復會之招加入革命，亦徐案中人物，辛亥紹興光復後

來主軍政，自稱都督，改名王逸，但越人則唯知有王金發而已。二次革命失敗，朱瑞為浙江將軍，承袁世凱旨誘金發至省城殺之，人民雖喜得除一害，然對於朱瑞之用詐殺降，亦弗善也。」（宇宙風六十七期）

魯迅怎麼會和這樣的一個人「是朋友」；而且會在他當都督時任校長呢？這不會和光復會毫無關係。尤可注意的是，「他的得任校長，是當局對前任校長不滿意，要他來繼任之後，可以從辦交代中，找出前校長的錯處，做一個堂堂的處理的。」（景宋：民元前的魯迅先生）這前任校長是杜海生，當局不滿意他的原因，「是一般青年革命者，認為杜先生在秋先烈殉難的時候，站在可以援救的地位而不援救。」（孫伏園：惜別）既然其中有此情節，大概不是非光復會會員所能出任校長的吧。還有，後來紹興少年們辦「越鐸」報來監督王金發，為什麼又要借用魯迅的名字作發起人呢？這恐怕不只在校長的地位，主要的還是他的革命事蹟，使那些少年們發生景仰，進而以為他的名字可使王金發見而知所檢束的吧。至於他後來常常用那麼親切的筆觸去述說那「用麻繩做腰帶的困苦的陶煥卿」；他對章太炎的終生敬禮不衰；民國後和蔡元培（亦光復會中堅）的相處甚得；我想，這都和入光復會有關，決不僅是什麼單純的「同鄉」或師生的關係所能解釋的。

至於在否認者的一方面，論據實在極不充分。周作人只說：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我不知道。」毫無道理，不在話下。至於王冶秋先生，則舉出魯迅自己所說的：「革命的領袖是要有特殊本領的，我卻做不到。」以及「兩地書」中的幾句話來作為「原因」。由引證的完全相同上看來，冶秋先生的結論，顯然是接受了景宋的影響而得來的。原來景宋在「民元前的魯迅先生」一文內，

有一段道：

「（魯迅）對於革命的運動，因着自然的耳濡目染，雖則知道得很清楚，似乎還沒有肯參加過實際行動。他總說：『革命的領袖者，是要有特別的本領的，我卻做不到。』」有一回，看見某君泰然自若地和朋友談天說地，而當時當地就有他的部下在實際行動着丟炸彈，做革命暗殺事情。當震耳響聲傳到的時候，先生想到那實際工作者的可能慘死的境遇，想到那一幕活劇的可怖，就焦灼不堪。的確是這樣脾氣的，他對於相識的人，怕見他的冒險。（見兩地書）而回顧某君，卻神色不變，好似和他絕不生關係的一般，使先生驚佩不置。所以他又說：『革命者叫你去，你只得遵命，不許問的。我卻要問，要估量這事的價值，所以我不能夠做革命者。』在『兩地書』中，先生也曾說過：『凡做領導的人，一須勇猛，而我看事情太仔細，一仔細，即多疑慮，不易勇往直前；二須不惜犧牲，而我最不願使別人做犧牲，（這其實還是革命以前的種種事情的刺激結果。）也就不能有大局面。』這就是說明他之所以終生是一個思想領導者而不是實際行動者了。」（抗戰文藝六卷四期）

景宋先生這段文字，初看去很容易令人誤會：以為依照她的意思，魯迅自然是不會加入光復會了。其實，仔細想想，她的意見，絕非如此，她引魯迅的話並非用來證明魯迅非光復會會員。——如果她引那些話是用來作為魯迅未會入會的「原因」，那便將解釋不通：不錯，魯迅在「兩地書」裏曾說過這些話；魯迅是思想領導者而不是實際行動的領導者；他沒有自己去或叫人丟過炸彈，這些都是實在的。然而這何害其為光復會的會員？難道一定要是「領袖」或「領導的人」

總會加入；或者，一加入之後，就一定非成爲「領袖」或「領導的人」不可嗎？事實上，光復會（以至一切政治集團）中並非人人都是「領袖」，人人都拋擲過炸彈。所以，許先生在這段文字裏，絕無證明魯迅未曾入會的意思。「魯迅是光復會會員，景宋知道得很清楚。所說『似乎還沒有參加過實際行動』這一句，係指沒有實地去運動那些秘密的會黨以及投炸彈，舉義旗……等事而已。」（許壽裳先生致作者函中語）明乎此，則王冶秋先生根據景宋所作的結語，自然是不可靠的；何況他除了從許文中轉錄魯迅的那幾句話以外，便別無其他材料和理由呢？

根據上述種種，我認爲：——魯迅的確是光復會會員。魯迅辛亥前在東京的志行，朋輩，以及辛亥後在國內的出處等等，證明了許譜的記載，胡文的問答，都是極可信的。

但爲了慎重起見，我更特地寫信法請教「年譜」的編著者許壽裳先生，問他所根據的是什麼？承他覆信說：

「光復會會員問題，因當時有會籍可憑，同志之間，無話不談，確知其爲會員，根據惟此而已。至於作人之否認此事，由我看來，或許是出於不知道，因爲入會的人，對於家人父子本不相告知的。」

這樣，魯迅之爲光復會會員，是毫無疑問的了。

最後，還得申明，魯迅是光復會會員與否，對於他的偉大，絕對無所增損；我們所認真探究的，只是事實而已。

一九四四年九月